

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 生成的理论逻辑

徐艳玲¹, 张光哲²

(1、2.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生成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是其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文明交流思想是其理论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其理论底色,西方和谐思想和全球治理理论是其理论借鉴。全面考量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对于系统认知和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开启新时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理论逻辑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20)01-0005-08

近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演绎和持续推进,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对话日益精进,文明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也亘古未有,文明冲突的论调再度出现。多元文明究竟该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又将走向何方?面临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持续发问,国际社会充满困惑和迷惘,急切期望听到“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文明交流互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不愧为人类文明困境下的理论突围。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学术界虽然围绕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价值意义、理论意蕴、实践进路等主题已多有探讨,但对这一重要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的挖掘尚有不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内容,全面考量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对于系统认知和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开启新时代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考察人类文明起源和世界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针对世界文明交往发表了诸多深刻的观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第一,对文明形态多样论的认同和升华。马克思、恩格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知高度,对人类文明的生成和演化进行了深

[收稿日期]2019-10-07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当代社会主义重点研究基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研究专项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21 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SDZXWT01)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创新项目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2019YB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1. 徐艳玲(1966—),女,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 张光哲(1996—),男,河南洛阳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刻剖析和科学研判,诠释了人类文明形态多样性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将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两个层面,强调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精神的交往是物质交往活动的产物。由此,“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人类在从事物质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2]。由此,在人类文明演化的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推动着人类历史滚滚向前,形成了横向上不同时期文明的循序演化以及纵向上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文明的多元并行,镌刻出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文明画卷。鉴于不同地理环境、人口数量、生产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之间所形成的交往形式也会千差万别,文明的呈现方式也因此形态各异,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确证。可见,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多样论从文明生成和文明演化的历史脉络中探析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历史必然性。以此为理论基石,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3]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文明多样性的高度认同,体现了习近平对人类文明形态多样性规律认知的升华。

第二,对文明交往开放论的把握和深化。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并非世界历史,人们生活在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之中,民族之间的交流完全出于历史的偶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世界历史逐步形成,世界文明也相伴而生。在资本统摄一切的资本主义文明里,资本贪婪的逐利本性促使它不断突破民族和地域的限制,开辟出世界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生产和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各民族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逐渐加深,人类历史也不再是以前

的“地域史”和“民族史”,而成了“世界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打破了民族国家之间长期以来的封闭和隔阂,不仅使物质生产走向世界化,而且使精神生产不再拘泥于狭隘民族区域的限定,逐渐走向世界化。伴随着世界历史和世界交往的形成,世界文明的大厦也初步落成。当今社会,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飞速发展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迎面而来,世界文明的深化发展获得新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文明开放发展的历史论断在新的实践样态中被演绎着、深化着。习近平深刻指出:“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4]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新动态,敏锐地洞察到网络空间作为人类的共同空间,正在成为世界文明深化交往的“新引擎”后,习近平深刻指出,“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5],要“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6],积极推进人类文明在网络化、科技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深度交往与融合,从而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之间交流互动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

第三,对文明交往意蕴论的遵循和拓展。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文明交往既能够实现文明的传承和“增值”,也能够实现人类社会的变革,因而对人类文明的漫长演变史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文明是具有继承性的,前人所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可以被积累、保存和延续,从而形成社会文化基因并进行代际传承,避免文明发展的“从头再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7]。另一方面,文明交往在本质上是多元文明成果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一种文明成果所创造的价值和效用能够在文明交流的过程中成倍增加。马克思曾高度肯定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世界意义,称之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8]。正是中国这三大发明的传入,使得西方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文明的价值也得以进

一步彰显。同时,伴随着世界交往范围的逐步扩大,“没有财产的”群众由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性的个人,联合行动开始成为他们挣脱束缚的主要斗争形式,人类社会也开始发生变革,迈向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遵循马克思主义文明意蕴论,习近平从双重维度揭示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9]。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0]。可见,文明交流互鉴所产生的影响从来都不是一维的、单向的,而是互学互鉴、彼此形塑的。正是在互学互鉴、彼此形塑的过程中,世界文明得以代代相传、繁荣昌盛。为此,习近平深刻指出,要推动不同文明包容互鉴、共同发展,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作用;要“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1]。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意蕴论的新拓展,而且是对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回响,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意蕴的理性升华。

二、理论源泉: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文明交流思想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国际社会多元文明共存中既有摩擦与碰撞,又有交流与交融。为此,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立足经济全球化视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明交流的新思想新理念,这些思想理念一脉相承,是前后相继的“源”与“流”的关系,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出场提供了直接理论源泉。

第一,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思想为文明交流互鉴确立了态度和原则。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多篇文章中,明确且深刻地回答了中国“要不要学习外来文化”以及“如何学习外来文化”这两大核心

问题。一方面,针对“要不要学习外来文化”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12]。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外来文化应该秉持学习和吸纳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再度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继续明确了学习外来文化的鲜明态度。另一方面,针对“如何学习外来文化”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3],即要采取冷静、客观和辩证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同时,毛泽东指出,要“……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14]。这些论述从学习方法和学习目标等方面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学习外来文化”的问题。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思想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的理论创新,为习近平在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指引。

第二,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为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发展方向。这其中主要关涉是否学习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成果和如何对待中西意识形态的问题。立足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汲取“关门建设”的历史之痛,邓小平提出,要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努力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15]。他还强调,“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16]。针对在向资本主义学习的过程中掀起的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激烈争论,邓小平从国家自身战略出发,提出了将“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这一新判断不仅坚定了人们学习西方文化和先进经验的信心和决心,而且凸显了中国对待外来文化的包容态度,为习近平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同制度文明的关系指明了发展方向。

第三,江泽民的文明多样性主张为文明交流互鉴夯实了基础。江泽民从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文明多样性的意义以及如何尊重和维护人类文明等方面阐释了文明多样性的思想。他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7]面对新世纪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日益凸显,江泽民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8]在承认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江泽民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各国的发展权利和道路选择;要积极开展与外来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要尊重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这些论断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生成夯实了基础。

第四,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思想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范式参考。2005年,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胡锦涛指出:“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19]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他又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20]这次讲话还把世界文明如何相处的问题放在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中进行深层考量。这些论断为习近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思考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问题提供了范式参考。

基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文明交流思想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21],“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2],“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23]。为此,习近平

强调,不同文明之间要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还强调,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之作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24];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25]。这些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文明交流思想的历史承继和创新发展。

三、理论底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

习近平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和为人处世的智慧对于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交流互鉴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的处世智慧、平等待人的思想观念、海纳百川的包容胸襟和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等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一,传承和阐发“和合”共生的处世智慧。在绵延了5000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深深地嵌入中华儿女的文化血脉,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等。中华民族的“和合”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记载,这一观念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形成了一整套维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与国之间和谐共处的价值原则和思想体系。从其蕴含的庞大思想内涵来看,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物齐论》)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所蕴含的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有“和也者,天下之达道”(《礼记·中庸》)所表现的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所内含的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等。这些精神内核相互交织、经久传承,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的处世智慧。在这一思想智慧的滋养下,习近平强

调,“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27],各文明之间要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28],要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同时,习近平多次引用蕴含“和合”理念的传统名言来阐发其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例如,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引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来阐释维护文明多样性的缘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他引用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论述来阐释文明相处要和而不同的道理;等等。由此观之,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尊重多元、和睦相处的鲜明底色。

第二,继承和创新平等待人的思想观念。虽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范式下,平等这一概念未被直接提及,但不同学派的观点争鸣,都暗含着平等的观念,这些为当今世界多元文明的相处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思想流派的主张来看,儒家孔子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教诲,认为在治国理政中要反对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墨家墨子有“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兼爱”智慧,强调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彼此关爱、和睦相处;法家韩非子有“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的果断,主张秉公执法,不畏权贵。这些早期的主张,虽然拘囿于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局限,其本质是调和矛盾、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但是其中蕴含的共同发展、平等关爱和一视同仁等理念,与习近平所倡导的文明之间相互平等的观念具有相通之处。习近平强调,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之间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他主张,要反对居高临下和傲慢偏见的态度,不搞唯我独尊,不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他曾赞美印度文明恢宏瑰丽、中东文明色彩斑斓以及印加文明灿烂夺目等。这些充分体现了他对世界文明的尊重和喜爱。同时,面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糖衣炮弹,习近平积极廓清认知迷雾,揭露了“普世价值”虚伪粉饰背后的霸权本质和文化优越心态,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为多元文明平等相处注入了一股清流。

第三,承继和拓展海纳百川的包容胸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而从未中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能够海纳百川、包容万物。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包容的智慧俯拾即是:《礼记·中庸》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周易》认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庄子·秋水篇》指出,“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等等。这些都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在面对“他者”和“异己”时包容的情感态度和价值抉择。正是在这种包容理念的引导下,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各派思想在交锋中交融,在交流中互鉴,达成了诸多共识;汉代董仲舒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不乏对其他学说的吸收和学习;魏晋之后,儒、释、道三教合一,形成了多元文明相互包容、互相吸纳的演进态势;明朝郑和远下西洋,留下了和平交往的历史佳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流变中虽饱经沧桑,但在文明交流互动中经久不衰、繁荣昌盛,熔铸了“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价值情怀与精神气质。扎根于富含包容因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之中,习近平深刻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种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就会走向灭亡,为此,“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29],要在文明包容互鉴中实现文明的发展。同时,习近平倡导要通过各种途径引导文化包容。例如,2017年,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号召以“一带一路”为载体,打造新闻、音乐等人文合作平台;2019年,在亚洲文明大会上,习近平提出,要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等等。这些实践和战略为多元文明包容相处搭建了平台,拓宽了路径。

第四,延续和升华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头活水,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早在商代《盘铭》上

就刻铸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警世格言，告诫人们世界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春秋战国之时，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篇》），感慨人生世事变化之快；到了西汉，桓宽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盐铁论·忧边》），传递出紧跟时代步伐进而改变行动策略的思想；再到北宋，程颐认为，世间法则“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周易程氏传·恒》），揭示了天地万物无时不变的深刻道理；等等。这种创新的精神品质承载着中国人民对现实生活的灵动把握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构筑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在这种创新思维的影响下，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变革创新”^[30]，“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31]。他强调，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32]，进而激活文明发展的动力，创造出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他指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33]，积极“盘活”蕴藏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使之成为当今社会所用。

四、理论借鉴：西方和谐思想和全球治理理论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倡导交流互鉴，注重汲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取长补短，兼收并蓄，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美好画卷。”^[34]习近平关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生成也吸取了人类文明的精华，自然包括对西方国家文明成果的吸收，具体而言，主要是以西方和谐思想和全球治理理论为理论借鉴。

第一，西方和谐思想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了借鉴。和谐历来就是西方哲人思索和探讨的命题，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古希腊时期，无论是赫拉克利特提出的辩证的“对立和谐观”，还是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抑或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中产阶级执政观，都蕴含丰富的对立统一、和谐相生的思想和智慧。到了近代，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人从封建制度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人性的尊重不仅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主要呼声，而且成为思想家们理论思考的“中轴”。在这一背景下，卢梭主张，“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35]，离开了自由谈平等，平等就不复存在，因此，要通过签订“社会契约”使个人与国家在政治权利、财产保护等方面达成一致，进而实现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等。洛克则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人最基本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要建立秩序，对人的这三种权利进行有效保护。在这一时期，通过让渡权利、组建国家使人类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黑暗走向光明，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追求社会和谐的主要理论构想。面对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人民普遍困苦和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批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极度憎恶资本主义制度的丑陋，纷纷著书立说，甚至付诸实践，极力向世人展现其头脑中奔腾起来的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例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分别主张建立“实业制度”和“和谐制度”；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将理论付诸实践，在美国进行了“新和谐公社”的实验。这些西方思想家对和谐思想的探索虽然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具有很大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甚至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中所蕴含的对和谐理念的阐释和追求，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2014年，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36]。西方优秀文化思想对习近平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为此，习近平指出：“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37]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与相得益彰是习近平主张文明交流互鉴的最终目的。这与西方和谐思想对和谐状态的追求具有某种契合性。同时，习近平强调，只要我们加强交流，持之以恒，偏见和误解就会消于无形。“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

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38]。这与西方和谐思想内含的矛盾双方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的逻辑思路具有某种相通性。

第二，西方全球治理理论为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生成提供了借鉴。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峻，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全球治理理论也自此诞生。在治理主体上，全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除了包括政府组织，还“涉及非政府组织、公民的迁移、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资本市场”^[39]。这一理念摒弃了传统单一主体垄断统治的理念。在治理方式上，全球治理理论要求，各主体之间要平等对话、维持互信，要通过协商和沟通建立协调机制，同时，要跟踪参与者的需求并对协调机制及时做出改进。在治理目的上，全球治理理论追求“善治”这一最终目标。然而，现有的全球治理实践与全球治理理论设想的初衷严重背离，在某种程度上沦为西方某些大国操控下谋求国家私利的借口。对此，习近平指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40]可见，习近平已经洞察到当今全球治理的不合理之处。然而，习近平对现有全球治理所采取的态度并非完全否定，而是积极推动现有治理秩序的与时俱进、变革创新。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年会上，他指出，“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41]；2015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上，他强调，要“塑造有利外部发展环境，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42]；2018年，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他主张，“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43]；2019年，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他强调，中法两国要“共同推进全球治理完善，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44]；等等。一路走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习近平用完善一词诠释出中国新一代政治家对现有全球治理所持有的理性姿态，展现出中国方案和中国理念诉诸“他者”的优秀治理经验的包容情怀。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理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文明交流思想与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之间形成了历史传承的“源”与“流”的关系。同时，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的生成还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西方和谐思想和全球治理理论借鉴的交互影响。这一纵横交错的思想链条，构成了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习近平正是在汲取前人思想智慧和理论精华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现了自身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融会贯通与时代升华。

〔参考文献〕

- [1][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204、187～188.
- [3][5][6][21][2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3～544、534、534、543、313.
- [4][2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9.
-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8.
- [9][11][36][38]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15、21、12.
- [10][22][29][31][32]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9、5、7、8、8.

- [12]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
- [13][14]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78.
- [15][16]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32.
- [17][18]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8、110.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850.
-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528.
-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1.
- [25]习近平.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2.
- [27]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8.
- [28][34]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10.
- [30]习近平. 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 [33]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
- [35][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M]. 李平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
- [37]习近平.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
- [39][瑞]英瓦尔·卡尔松,等. 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M]. 赵仲强,等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2.
- [40]习近平. 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7~18.
- [41]习近平.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
- [42]习近平. 开拓机遇 应对挑战:在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上的发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
- [43]习近平. 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
- [44]习近平.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9-03-27.

[责任编辑:李曼]